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1-0052-08

廖平经学思想初探

崔海亮

[摘要] 廖平一生以知圣译经为学术追求,虽然他治经的方法多样,经学思想多变,但是他尊孔尊经的治经宗旨始终没变。廖平以礼制分今古的理论是他在经学史研究上的重大创见,以制度为纲对经典世界重构的经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经学六变的学术历程则体现了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体系转化的困境。廖平经学理论建构中对制度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制度建设也仍然具有重大启示。

[关键词] 廖平;尊孔尊经;治经方法;经学理论建构;现代学术转型

[中图分类号] B25 **[文献标识码]** A

廖平(1852—1932)是近代今文经学大师,也是清末民初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廖平选集》的主编李耀仙先生说:“他(廖平)是一个经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家。”^[1](第18页)冯友兰先生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最后一章,专门用两节内容讨论廖平的学术,并认为“廖平之学,实为中国哲学史中经学时代之结束”^[2](第343页)。由此可见廖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廖平一生经学屡变,从一变“平分今古”,到二变“尊今抑古”,再到三变“古大今小”,一直到后三变的“天人之学”,其经学思想先后经过六次重大变化。而且,其研究的领域广涉经学、史学、诸子、医学、堪舆、方技等多方面,仅已刊行的著作就有100多种。既使很多研究者望而却步,又使一些研究者往往顾此失彼。近年来,伴随经学研究的复苏,对廖平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出现了一些有水准的廖平研究专著和论文^①。然而,大多数学者对廖平的评价还仅停留在肯定其一变“平分今古”的贡献,而对其后三变“天人之学”普遍评价不高,并且还认为“后三变”的内容“怪诞荒谬”,方法“穿凿附会”。本文在吸收近几十年廖平研究主要成果的基础上,认定要通观廖平经学“六变”的过程,才能把握廖平经学的思想精髓,并从廖平个人的学术理想追求、思想主旨、治经方法、时代局限等多重视角,考察廖平经学变得“怪诞”、“附会”的原因,并通过廖平这一具有独特历史地位的经学家的思想个案,揭示“传统经学”如何吸收现代思想资源,在现代学术环境中获得新学术生命,从而化为现代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提供固有的“支援意识”。

一、廖平的学术追求与治经宗旨

(一)知圣译经的学术追求

晚清经学的发展固然有其内在理路可循,但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说,西方文化入侵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挑战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晚明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文化的传播逐渐打破了中国士人天朝上国的迷梦,对中国传统士人的文化信仰、认知世界的方式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影响随着鸦片战争西方的军事入侵而进一步加剧。面对西方的挑战,当时不同的学术派别都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就廖平所处的时代而言,这些派别大约可分为宋学立场的顽固派、古文经学立场的洋务派和今文经学立场的维新

派^②。廖平的立场大致处于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他与洋务派的代表张之洞和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都有密切的联系^③,但他们的学术与政治立场却不尽相同。张之洞主张学习“西艺”“西政”以强国富国,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以救国。张、康的学术主张落实于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而廖平好像只是热衷于思想的建设而没有表现为政治行动。因为廖平的学术追求在于“知圣”,人生使命在于“译经”。《知圣篇》就体现了廖平的这种学术追求。在《〈知圣篇〉读法》中廖平说明了他写作的目的与张之洞不同:“《劝学篇》兢兢于开民知,此编特为开士知。”^[3](第609页)从思想启蒙的角度看,“开民智”与“开士智”的对象不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乃至五四运动,廖平都没有参与,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开民智”的活动,而与他“开士智”的学术旨趣无关。那廖平为什么要“开士智”呢?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弊端不在于技艺的落后和制度的腐败,而在于学术的败坏。士人湮没于八股之学,沉溺于文字训诂,对圣人经典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全然不知。实际上,孔子受命制作,在六经中已经为后世创立了无所不包的制度。因此,关键在于知圣,只要理解了圣人的微言大义,所有的积弊都可一扫而空。那么,怎样才能知圣?廖平认为圣人的“隐微之言”只有通过贤者的翻译才能明白。他自己就以贤者自居,把翻译经典当作自己的人生使命。知圣译经就成了他不懈的学术追求。

(二) 尊经尊孔的治经宗旨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形式,处于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其前提在于经典是经学研究者的尊崇和信仰的对象,具有绝对的权威。首先要信仰经典的绝对权威,而后才可能体会到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才能明白圣人“制作”的目的意图,才能正确地贯彻经义于政事中。这一点在今文经学家廖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廖平的治经宗旨与其对经的信仰是分不开的。

廖平认为“六经”均为孔子所作,必须明白经的性质而后才能治经学。他说:“学者必先知圣而后可以治学,必先知经而后可以治中西各学。”^[4](第119页)廖平认为孔子作为受命改制的圣人,只可知而不可学。他作《知圣篇》的目的就是为了树立孔子的绝对权威,要人们明白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廖平一生以“尊经尊孔”为宗旨,他在《孔经哲学发微》中这样说:“平毕生学说,专以尊经尊孔为主。”^[5](第303页)他的一生也在实践着这个宗旨,自号“四译”(或“四益”)、“五译”、“六译”,终生充当着孔经翻译者的角色。在受到西学冲击和国内“废经”呼声的威胁下,廖平尽力维护孔子和六经的神圣地位。他把孔子和《六经》看作是中国的精神命脉之所在,主张立孔教为国教。他说:“知天生孔子作《六经》,立万世法。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亦不再生孔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其所以能统一全球也。”^[6](第24页)他不仅信仰孔子的绝对权威,而且相信孔子为受命改制的素王,在2000年前已为全球制定了制度,其制度无所不包,可以统一全球。正因为廖平对孔子和《六经》抱有如此信念,所以他就不断地神化孔子和《六经》,以致到最后“孔子乃得为全球之神圣,六艺乃得为宇宙之公言”^[7](第551页),孔子由中国一隅之圣人进而为全球圣人,俨然成了全球一统的教主。

二、廖平治经的方法

廖平的学术追求、治经宗旨是通过他治经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学术追求和治经宗旨是他的世界观,而治经方法则是他的方法论。通过对廖平治经方法的考察,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他尊经尊孔的思想宗旨。概括来说,廖平治经的方法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严分经史

按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方法,经处于首要地位,而史只能处于次要的甚至从属的地位,这种分类方法也体现了对经的推崇。但是从宋人疑经之风兴起后,“经”的权威地位不断受到“史”的挑战。从王阳明的“五经皆史”到李贽的“六经皆史”^④,对圣人和经典的权威造成很大的冲击。乾嘉学派兴盛时,针对考据学远离现实的弊端,章学诚提出较为系统的“六经皆史”的史学经世理论,不仅冲击了经学的权威,而且直接威胁到经学的地位。既然经学已不再是“经世之学”,那么就应该由史学来取代。这一思路经章自珍的发展,到晚清与古文经学派合流,“六经皆史”说大肆流行。章太炎、刘师培、邓

实等皆主此说。顺着这一思路继续发展,就促使了民国“古史辨派”的兴起,经学退出了学术主流,而逐渐为兴起的“新史学”所取代。

作为今文经学家的廖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六经皆史”说的危害。所以他治经首先要严分经史。在《今古学考》中,廖平认为今文经学为经学派而古文经学为史学派。在《知圣篇》中,他进一步区分了经学与史学的不同,认为“经学与史学不同:史以断代为准,经乃百代之书”^[1](第214页)。史学主要记述以往旧迹,而经是孔子立言,寄寓了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作为后世的制度大纲,万古永新,垂范后世。在《孔经哲学发微》中,廖平又进一步认为经学是哲学,以区别于史学。他还用“旧史新经”来区分经史,认为“孔子以前之书,古皆称史;同属拼音字母”^[1](第303页),孔子却创立了图画古文字,“新经为孔字,如今华文”^[1](第304页)。概括来说,廖平对经史的区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有笔削微言,史乃事实记录;经制文明,史事野蛮;经乃百代之书,史以断代为准;经为空言(哲学),史为成事;经乃孔子雅言,史为拼音字母。廖平明确区分了经典世界与历史世界的不同,认为这两个世界是不容混淆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廖平对龚自珍、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说:“贾、马、许、郑及《三通》各书,直以孔为书傭档史……如龚定菴、章实斋之流,以经为古史最谬。”^[1](第299-300页)廖平强调经、史之别,认为子学皆出孔后,后世所传古书,全为孔经之传记,实际上是主张经包括史,史学从属于经学。廖平以“孔子创立文字”说来对抗“六经皆史”说,其立论的可靠性大可怀疑。但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孔子和六经的地位,如果承认了“六经皆史”说,那么经就等同于官方档案,而孔子的地位与古代的史官就没有什么区别。廖平相信,六经都是圣人创制立法的经典,经书寄寓了孔子创制的微言大义,也是儒生经世实践的根据。经的生命力根植在儒生的这种信仰之中,是万古长新的。因此,决不能以史学家的眼光把经典看作是先王之陈迹。

(二)推明制度

以制度说经是廖平治经的一大特点,也是今文经学的传统。从今文经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西汉今文经学产生于制度的焦虑,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为汉代的大一统提供制度上的论证。晚清今文学的复兴也在于为晚清的制度变革提供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因此,廖平以制度说经也可以说是继承了今文学的传统。但是由于两汉家法在晚清已经混杂不明,多数学者遵循的仍然是“由小学入经学,其经学可信”的古文经学的治经路数,侧重于文字训诂而割裂了经学与政教体制的联系。廖平却能独辟蹊径,考镜源流,上溯西汉,从制度入手来研究经学。

廖平认为经学中最关键的在于制度,他说:“六经旨要,以制度为大纲”,“予故以为经学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1](第185、471页),他认为制度无所不包,只有推明制度,才能收到通经致用的效果。廖平主要从《王制》入手治经学。他说:“近贤论述,皆以小学为治经入手,鄙说乃易以《王制》。通经致用,于政事为近……近贤声训之学,迂曲不适用……非禁人治训诂文字,特不可湮没终身耳。”^[1](第208页)廖平认为文字训诂之学空虚而不切实用,如果学者沉溺其中,对政事经济茫昧无知,遑论救国?而《王制》则不同。廖平认为《王制》为六经纲领,其中包含了后代的许多制度。如后世的职官志、地理志、选举志、礼乐志、刑法志等,在《王制》中已包罗无遗。“大约宏纲巨领,皆已具此,宜其为一王大法欤”^[1](第106页)。既然《王制》是孔子为后世所立的“一王大法”,那么《王制》自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王制》要垂范百代,为后世所取法。基于对《王制》这样的认识,廖平就非常重视对《王制》的研究。他用《王制》与《周礼》所载礼制的不同来推明今古之分的源流,阐发孔子素王托古改制的微言,也与他《王制》的认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沟通中西

沟通中西是廖平治经的一个特点,构建孔经哲学体系就是他沟通中西的一种尝试。在《孔经哲学发微》中,廖平说:“平毕生学说,专以尊经尊孔为主,兼采泰西科学之理而沟通之。”^[1](第303页)从《孔经哲学发微》一书来看,廖平主要吸收了西方的地理学、天体物理学和伦理政治学说等。虽然他坚持“西学中源说”的基本立场,但并不排斥西学,而是看到中西学术各有所长,试图融合中西而构建一套新的孔经思

想体系。

在《治学大纲·渊源门》中，廖平这样讲：“讲学者当以祖学为主，新学为辅，混而为一，不可歧而为二……故谈理言学之书，贵于汇通中外。”^[4]（第 119 页）他主张保持中学的主体地位，用西学来辅助补充中学。在此前提下，通过中外汇通，实现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化。在传统经学受到西学威胁的情况下，廖平的这种思路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学术发展策略。在《孔经哲学发微》中，廖平以西方词语“哲学”来替换“经学”，也体现了廖平想把经学纳入现代西方学术体系的一种思考。在《治学大纲》中，廖平以传统的“孔门四科”为基础，把学术范围分为六门，以对应于当时的学科划分。《渊源门》主要讲“西学中源”，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世界门》主要讲舆地疆域，对应于当时的地理学。《政事门》主要讲经学的政治典章，对应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学。《言语门》讲语言辞令，比附于当时的外务外交学。《文学门》讲诗赋辞章之学，对应于当时的语言文字学。《子学门》讲诸子之学，对应于当时的自然科学。这样一来，所有的西方学科都被纳入了孔经哲学体系之中。这些划分虽然有比附牵强的成分，但也体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信仰中国经典的学者对传统经学发展前途的思考。在西学不断涌入中国的潮流中，他试图以中国传统经学为依托，从中国学术内部寻求向现代转换的思想资源。以孔经为所有学术的根源，目的还是为了彰显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

此外，比附类推的方法也是廖平治经的一大特点。方法虽然多样，思想虽然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廖平治经的方法都是为他尊孔尊经的目的服务的。严分经史是为了突出经的神圣地位，推明制度是为了说明孔经中有圣人的创制立法，沟通中西是为了说明孔子不仅是中国的圣人，也是全球的教主。

三、廖平经学思想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

（一）廖平治经的贡献

总的来讲，廖平能坚持比较融通的治经方法，因而在经学研究、乃至医学、堪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据台湾学者陈文豪统计，廖平已刊未刊的学术著作有 397 种^⑤，几乎涉及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领域，现列表将廖平的著作（包括已刊未刊）统计如下：

表 1 廖平学术著作统计表

类别	经	史	子	集	总计
数目	252	27	102	16	397

表 2 廖平经部学术著作细目表

诗	书	礼	乐	易	春秋	孝经	四书	小学	诸纬	群经总义	总计
25	18	50	7	23	46	6	13	20	10	34	252

表 3 廖平子部学术著作细目表

儒家	医学	道家	堪舆	阴阳家	名家	诸子总论	杂说	总计
25	39	10	5	3	3	3	14	102

由表 1、表 2、表 3 可以看出，廖平的学术成就涉及经、史、子、集各方面，主要集中在经、子方面。就经部而言，主要成就为《礼》和《春秋》的研究，所以刘师培说廖平“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其洞察汉师经例，魏晋以来，未之有也”^[5]（第 105 页）。就子部而言，主要成就为儒、医、道、堪舆的研究。但就整体而言，廖平的学术旨趣在经学。在《答王聘三论地学书》中，廖平这样说：“弟专以研经为主，医与堪舆，余力及之。”^[6]（第 45 页）虽然廖平也在医学和堪舆方面有所发明，但其治学的旨趣在经学，成就最大的也在经学。

概而言之，廖平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为解决今古学问题指明了方向

今古文经学是两汉时治经的两个不同派别,但由于东汉末郑玄注经杂采今古,混合了今古两派的家法,以后的学者对于划分今古文经学的标准就不清楚了。当时的经学家普遍认为今古文经学的区分在于文字不同。今文经用汉时通用的隶书写成,而古文经用战国时的籀书写成。也有的认为今文经立于学官,而古文经行于民间。但廖平经过研究发现,书写文字的不同和立不立学官,都不是区分今古学的关键,其关键在于礼制的不同。

廖平首先区分了今文与古文、今学与古学。他认为今文与古文是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汉以前就存在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别。西汉所立的五经博士和东汉所立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自西汉末刘歆争立古文经博士以后,才有了今学与古学的对立。今学与古学都认为自己对经典的解释才是符合经典原意的。即今文与古文是书写文字的不同,而今学与古学则是对经典解释方法的不同。自郑玄解经杂采今古后,就混合了这两种不同,从而使今古学的家法暗而不明。

廖平的《今古学考》从对《五经异义》的研究出发,把郑玄混乱了的今古学家法重新理清,认为今古之分的关键在礼制。即今学宗《王制》,古学宗《周礼》。今学为孔子晚年“改制”之说,古学为孔子壮年“从周”之说。用《王制》来考察今文经,道一风同;用《周礼》来考察古文经,无不相合。廖平以礼制来区分今古学可以说抓住了关键,也可看作是其一大发明。时人以此比于顾亭林之于古音,阎若璩之于《古文尚书》,为清代三大学术发明之一。后人多沿用其说。如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在《经今古文学》一文中,认为“今文学崇奉孔子,古文学崇奉周公;今文学为经学派,古文学为史学派;今文学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古文学以《周礼》为主”^[7](第9页)。这些方面的区分基本上采用了廖平的观点。但是,廖平的论证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根据许慎的《五经异义》并不能得出“今与今同,古与古同”的结论,实际上许多经学家都是今古兼采的。在当时就有许多学者反对廖平的这一分法,如刘师培和章太炎以及后来的钱穆都对廖平进行批驳^⑥。廖平在后来也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三变”以后就不再讲今古之分了,而是认为中国各家各派的学术都是相通的、融合的。今古学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但是廖平以礼制为标准来区分今古的方法基本上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⑦。蒙文通认为,廖平的“平分今古”之论“使清代百余年间争论纷纭而不能解决者,至此而得到彻底解决的方向”^[8](第134页)。蒙氏所论虽有溢美之嫌,但也说明了廖平在解决今古学问题上确实有重大贡献。从当前有关今古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廖平以礼制分今古的方法是解决今古学问题的一个最为可行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廖平为解决今古学问题指明了方向。

2. 为晚清的制度变革提供理论先导

廖平经学六变的主题虽然各不相同,但在“以制解经”这一点上则是一贯的。廖平一变以礼制平分今古,其目的并非只是为了解决经学史上的争端,实际上是针对晚清弊政而言的。如他在《今古学考》中所说:“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张也。”^[1](第85页)到二变时的“尊今抑古”,主要讲素王托古改制,并同时写了《改文从质》等政论性文章,要求改革的政治诉求进一步明显。三变则是融合传统经学中的“三世说”、“三统说”、“大一统”等经学理论而提出了“小统大统”说,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的中西问题。后三变的“天人之学”则是对宇宙秩序的设计,是对人类未来的一种规划。在今天看来,廖平以礼制分今古之所以能产生很大影响,并不在于其划分是否科学,而是他对制度的设计正好迎合了晚清制度变革的思想潮流。康有为更是“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9](第199页),康氏因袭廖平《古学考》与《知圣篇》而作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对晚清社会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进而造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变革运动,这些都是晚清士人“制度的焦虑”在行动上的展开。因此,在评价廖平思想时,既不能对他经学史上的贡献过分夸大,也不能对他经学理论的构造一笔抹杀。在晚清的政治变革中,廖平的经学思想起了理论先导的作用。

3. 为传统经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传统经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吸收外来文化以促成本民族文化的更新是中国文化得以不断保持活

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汉以后佛教文化的传入不仅仅是对传统经学的发展构成挑战,更是传统经学更新的一个契机。宋明理学的出现与佛教文化的刺激不无关系。晚明西方文化的传入可以说是传统经学更新的另外一个契机,明末清初的一些士人也在试图了解西方,如徐光启、梅文鼎,乃至康熙本人。鸦片战争以后,西学更是如潮水涌入。学习西方成为潮流。只不过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使学术的发展显得相对滞后,传统经学还来不及消化吸收西方文化而错失了这次发展的机遇。他提出的“以祖学为主,西学为辅”、“汇通中外”的解决中西问题的思路,也是当时学术思潮的一种表现。廖平认为中西学术各有所长,“夫工械算计,本为泰西专长;形上之道,维我独优。以有易无,各得其所。”^[1](第323页)中西互通有无,相互补充,才能各得其所。这种思路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的观点一致,如贺麟、金岳霖、冯友兰等。贺麟在《儒学思想的新开展》中这样讲:“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10](第88页)虽然贺麟与廖平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对于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如何发展中国的传统学术,他们的思路却基本一致。廖平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可以与西方相嫁接的思想资源,试图把他所接触到的各种知识都纳入孔经哲学体系中。他的思路体现了对当时经学的发展和转型的一种思考,他构建孔经哲学体系也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一种尝试,虽然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但廖平的思路毕竟启发了后人,实际上,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要用会通中西的方法来实现中国学术的创造性转化。

(二)廖平治经的局限及其理论的深层矛盾

廖平经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有明显的弊端。廖平构建孔经哲学体系的失败就说明了他的局限性,这种局限首先体现在他对西学缺乏足够的认识。

从廖平构建的思想体系来看,他对西学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仅限于西方地理学、天文学和民主政治学说的一些常识。而且由于他坚持“西学中说”的立场,对西学往往流于比附式的理解,难以领会其精神实质。他认为西方的自然科学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学,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只不过是“虚理”,很难在中国实行。廖平对西学的这种比附式的理解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实质相差甚远,既然没有达到对西学的真正理解,则所谓的“沟通中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廖平建构经学体系的失败是他经学思想深层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矛盾表现为其治经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效果之间的矛盾,经学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前者通过后者表现出来。廖平治经的宗旨是尊孔尊经,但同时孔子和六经又被他作了随心所欲的改造。他认为孔子在六经中的“微言”要经过他的翻译才能明白,而他的翻译最终成为随心所欲的比附和牵强附会,很难被人所凭信。为了说明今文经是孔子的真传,他斥责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既然古文经可以被他人伪造,那么今文经也何尝没有伪造的可能?这些都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孔子和六经权威的怀疑,这种弊端章太炎批评得很深刻,他说:“廖氏之见,欲极崇孔子……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邪?孟、荀、汉儒书,非亦刘歆所造耶?……廖氏不言,后之人必有言之者,其几盖已兆矣。”^[11](第56页)章太炎的担忧并非多虑,廖平虽然只说部分古文经为伪,但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则宣布全部古文经为伪,到“古史辨”学派的全面疑古,几乎所有的经典都被怀疑,孔子最终被认为只是编纂教材的教书匠。这些恐怕都是廖平所意想不到的。

廖平经学理论的内容与形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他本来是借助今文经学的形式来推崇孔子,但是又突破了今学的家法和师法,泯灭了今古学的界限。其后三变的“天人之学”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经学的范围。廖平最终把孔子神化为全球神圣,把孔经构造为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这样的思想体系也免不了“虚幻”、“怪诞”的讥讽。冯友兰的“旧瓶新酒”之论很形象地说明了廖平经学理论与形式的矛盾^⑧。当然,冯先生的“旧瓶新酒”之论并不只针对廖平的经学理论而言,它表明了在中西冲突的思想背景下,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尴尬。但廖平经学思想体系的深层矛盾无疑是这种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正是从近代学术转型的意义上,冯友兰先生说,廖平之学标志着经学时代之结束。

廖平构建的孔经哲学体系的失败是特定时代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主观方面来看,廖平西学知识的局限、过度的尊孔以及牵强比附的解经方法都影响到他的结论的可靠性。从客观方面

来看,在当时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渐取代“四部之学”的情况下,传统经学处于被消解的地位,很难被纳入到当时的学科体系之内。因此,廖平的失败不仅有廖平自身的局限,也有时代的局限。廖平的弟子李源澄对此有精辟的评论,他说:“廖师精卓宏深,才实天纵,惟为时代所限,囿于旧文,故不免尊孔过甚,千溪百壑,皆欲纳之孔氏。又时当海禁初开,欧美学术之移入中土者疏浅且薄,不足以副先生之采获。先生虽乐资之为说,而终不能于先生之学有所裨。使先生之生晚二十年,获时代之助予,将更精实绝伦也。”^[5](第 106 页)知师莫若弟子,李源澄对乃师的评价可谓切实而精当。

四、结 语

廖平的经学思想是独特的,但是其思想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则是普遍的,他的思想并没有脱离当时的时代主流之外。从我们今天看来,廖平的经学思想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1. 经典的诠释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或者说怎样保证解释的有效性?

廖平把主观随意的翻译当作经典本身客观的含义,这种翻译的客观性就大可怀疑。如果不能保证解释的客观性,不能遵守一些基本的公认的解释原则和方法,那么解释的结果就很可能是胡说八道,廖平从贤者译经到代圣立言的学术历程为我们今天诠释经典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2. 如何认识传统中的制度资源?

如《王制》、《周礼》中的制度设计对我们今天的制度建设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借鉴?包括廖平的“大统小统”学说对当时世界的规划,“天人学”对宇宙秩序的设计,对于我们当今的世界冲突有哪些启示?

3. 如何认识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体系的转化?

廖平被冯友兰先生认为是经学时代结束的标志性人物,其学术经历自然独特,但廖平经学研究的失败是否具有必然性?廖平的失败能否标志着经学的衰亡?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不能不进一步思考的。

廖平经学理论的构造是失败了,但是他对传统经学中制度的探索、对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尝试仍然具有重大意义,有时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深刻。因此,我们在评价廖平的时候,不能只肯定他经学史研究的成就,而对他后三变经学理论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一笔抹杀。如果结合晚清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时代过渡的思想背景,重新考察廖平经学理论建构中对制度的探讨,我们可能会有新的认识。

不管我们对经学抱着什么样的感情,经学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我们今天对经学的研究只能是经学史的研究。我们固然要理清经学史上的不同流派,梳理经学家的经学理论,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探求经学家的思想与现实的关联。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历史与历史背后的现实相关联的角度看,中国经学史的背后是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因此,以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视野研究经学,挖掘传统经学中的制度资源,并说明这些制度的哪些方面可以为今天的制度建设提供借鉴,才是我们当前经学研究的方向。

注 释:

- ① 专著主要有:大陆学者黄开国的《廖平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台湾学者陈文豪的《廖平经学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5 年版;赵沛的《廖平春秋学研究》,巴蜀书社 2007 年版。近期研究廖平的论文主要有:林淑贞:《廖平经学六变所建构的历史图像》,载《中国学术年刊》1997 年第 18 期;路新生:《廖平〈今古学考〉经学思想体系中的几个问题》,载《孔孟学报》1998 年第 76 期;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载《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郇积意:《汉代今、古学的礼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学考〉为讨论中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 年第 1 期。
- ② 本文对这些派别的划分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做的一个大致区分。实际上汉宋之争后的学人一般持汉宋兼采的态度,如洋务派的代表曾国藩、张之洞,如果再将二人具体区分的话,曾氏是宋学倾向多一些,而张氏则是古文经学倾向多一些。但顽固派一般持宋学立场,而维新派则多为今文经学倾向。
- ③ 张之洞可以说是廖平的老师。廖平 1874 年参加院试被当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拔置为第一。廖平所著的《古学考》与《知圣解》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产生直接影响。

- ④ 张舜徽先生认为“六经皆史”说出于王学传统。王阳明《传习录》有“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李贽《焚书·经史相为表里篇》有“《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以后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有“史之外无文字焉……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详可参见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0页。
- ⑤ 陈文豪对廖平的著作做了一个十分详细的目录,详可参见氏著《廖平经学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39-103页。
- ⑥ 刘师培针对廖平一变著有《汉代古文学辨诬》,章太炎针对廖平二变著有《今古文辨义》,二者站在古学家的立场上对廖平的一些疏漏进行批驳,使廖平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结论。后来钱穆批评廖平,认为汉代根本不存在如廖平所说的今古之争问题,所谓的今古之争不过是清代学者们自己的设定。钱穆对今古之争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国学概论》等著作中。
- ⑦ 关于今古学问题近期的研究成果有:李学勤的《〈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载《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路新生的《廖平〈今古学考〉经学思想体系中的几个问题》,载《孔孟学报》1998年第76期;沈文倬的《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载《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郅积意《汉代今、古学的礼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学考〉为讨论中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1期。虽然他们对今古学的看法各不相同,但都认为以礼制来区分今古学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 ⑧ 冯先生认为传统的经学形式是“旧瓶”,当时的西学是“新酒”,“旧瓶”已不能容纳“新酒”而呈现出“破裂之象”。详可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参 考 文 献]

- [1] 《廖平选集》上,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版。
-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3] 《廖平选集》下,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版。
- [4] 廖平:《治学大纲》,载《六译馆丛书》47册,成都:存古书局1921年版。
- [5] 廖幼平:《廖平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版。
- [6] 廖平:《地学答问》,载《六译馆丛书》42册,成都:存古书局1921年版。
- [7]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8] 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载《孔子研究论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 [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10]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 [11]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载《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责任编辑 涂文迁)